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仫佬山乡

MULAOSHANXIANG

——广西罗城县大梧屯调查与研究



周玉蓉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么佬山乡

——广西罗城县大梧屯调查与研究

Mulao Shanxiang

Guangxi Luocheng Xian Dawu Tun Diaocha yu Yanjiu

周玉蓉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大新行政村大梧屯为调查点, 调查内容涉及仫佬族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包括社会与权力控制、生育文化与保健、婚姻与家庭结构、经济生产、精神文化生活、语言文字、卫生科技、伦理道德等各个层面。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 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 马 岳 装帧设计: 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仫佬山乡——广西罗城县大梧屯调查与研究/周玉蓉主编.—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47-294-5

I. 仫… II. 周… III. 仫佬族—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IV. K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776 号

仫佬山乡——广西罗城县大梧屯调查与研究

周玉蓉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mayue119@139.com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作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80247-294-5 / G · 269 (102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龠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实实在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龙脊

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广南阿科——云南广南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

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目 录

总序	i
第一章 简介	1
一、历史沿革	1
二、民族构成和分布	2
三、交通	3
四、经济发展概况	3
五、调查点大梧屯概况	4
第二章 人口结构	5
第三章 经济	9
一、经济变迁过程及经济概况	9
二、农业情况	13
三、养殖业情况	21
四、商业情况	26
五、运输业、建筑业情况	34
六、外出务工情况	36
七、其他副业	36
八、家庭经济状况统计	36

第四章 生活习俗	37
一、住宅建筑	37
二、饮食	40
三、服饰	43
四、生活能源	46
五、丧葬礼仪	49
六、节庆	54
第五章 婚姻家庭	56
一、婚姻	56
二、婚俗	61
三、生育	65
四、家庭	66
第六章 社会与权力控制	69
一、传统民间组织的变化	69
二、大梧屯的村民自治	74
三、大梧屯的民间管理	81
第七章 宗教信仰	90
一、大梧屯的庙宇	90
二、依饭节	94
三、大梧屯的庙会	96
四、祖先崇拜	97
第八章 语言文字与信息传播	101
一、语言使用情况	101
二、信息传播	102
第九章 教育	104
一、四把镇教育状况	104
二、大新村教育状况	105
第十章 卫生科技情况	111
一、大梧屯诊所概况	111
二、幼儿接种疫苗情况	111
三、计划生育工作	112
四、传统治疗方法——刮痧	113
五、大梧屯民间医术——草药	113
六、职业病	113

七、科技情况	113
第十一章 族群关系	115
一、族际关系	115
二、村落关系	117
三、族内关系	119
四、冬内关系	121
五、外迁居民与迁出地村民的关系	123
第十二章 伦理道德	125
一、敬老爱幼	125
二、“娘亲舅大”	126
三、婚姻观	126
附录	127
附录 1: 大新村三个自然村分布图	127
附录 2: 大梧屯北部房屋分布图	128
附录 3: 大梧屯南部房屋分布图 1	129
附录 4: 大梧屯南部房屋分布图 2	130
附录 5: 大梧屯全貌	131
附录 6: 实习队在大新小学门前合影	132
附录 7: 周玉蓉与大新村村民委员会吴太亮主任合影	133
附录 8: 四把镇简介 1	134
附录 9: 四把镇简介 2	135
附录 10: 大梧屯修路纪念碑	136
附录 11: 修建村大门碑	137
附录 12: 大梧屯修路碑	138
附录 13: 判词碑	139
附录 14: 大梧村村史	141
附录 15: 大梧屯二冬族谱前言	145
附录 16: 大梧屯六冬族谱引言及编后语	146
附录 17: 三冬族谱	147
附录 18: 吴开庭个案	148
附录 19: 吴开寿个案	149
附录 20: 吴人举个案	150
附录 21: 吴才达个案	151
附录 22: 吴桂群个案	152

附录 23: 吴长青夫妇个案.....	153
附录 24: 吴东强个案.....	154
附录 25: 吴玉辉个案.....	155
附录 26: 吴新强个案.....	156
后记.....	157

第一章 简介

罗城仡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辖8个镇和5个乡，行政区域总面积2658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2.23万公顷，粮食播种面积3.7万公顷，经济作物种植面积1.58万公顷，有林面积12.37万公顷。总人口35.48万，其中农村人口30.73万。罗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有仡佬、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25.81万人，其中仡佬族占罗城总人口的31.2%。罗城境内矿产资源丰富，重要矿产有煤、铁、锡、铜、锑、铅、锌、水晶和重晶石。土特产有茶叶、香菇、木耳、沙田柚、甜竹、蒜薹等。县人民政府驻东门镇，岔罗铁路和省道20251线过境。^①

一、历史沿革

罗城仡佬族自治县，原为罗城县，解放初由天河、罗城两县合并而成。

天河县始置于唐贞观四年（630），县治旧在东乡中里旧县村（今四把镇里胜村旧县屯），明万历十九年（1591）迁于今天河街。初属岭南道粤州，唐高宗乾封中改称宜州。宋初仍属宜州，大观元年（1107）割附融州；靖康元年（1126）复隶宜州（南宋时改称庆远府）。元代属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后改为庆远路总管府）。明代属右江道庆远府。清仍明制。民国时期初属柳江道，后属庆远行政督察区。

罗城县始置于宋开宝五年（972），分融水、武阳二县地置罗城县。传说因县城四周群峰环绕，罗列如城而得名，属广南西路融州。熙宁七年（1074），武阳、罗城二县俱入融水县。崇宁二年（1103），二县地改置乐善县，南宋时改置乐善州，旋废，地仍入融水县。明洪武二年（1369），复置罗城县，初属融州，后属左江道柳州府。清仍明制。民国时期，初属柳江道，后属庆远行政督察区。^②

① 河池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资料。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写组：《罗城仡佬族自治县概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1949年11月,罗城、天河二县相继解放。1950年1月1日,分别成立县人民政府。1952年8月1日,两县合并,定名罗城县。1983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罗城县,在其原行政区域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为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1984年1月10日,自治县第一届人民政府诞生。后以1984年11月23日为自治县成立之日。2004年11月23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庆祝自治县成立20周年。

二、民族构成和分布

据1982年普查,该县总人口294 530人,有汉、壮、仫佬、瑶、侗、苗等8个定居民族,还有外来的回、满、水、蒙、黎、土家、毛南等7个民族。仫佬族有69 23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3.5%,占全国仫佬族总人口的80%左右。其他民族人口及其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壮族126 262人,占42.9%;汉族84 092人,占31.9%;瑶族2623人,占0.9%;侗族1277人,占0.4%;苗族924人,占0.3%;其他少数民族116人,占0.04%。全县少数民族人口合计210 438人,占全县总人口约71.5%。^①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全国仫佬族人口总数为159 328人(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侨居国外的仫佬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122 400人,占76.8%。河池地区的仫佬人主要居住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共有101 378人,占全国仫佬族人口总数的63.6%,占河池地区仫佬族总人口的82.8%。^②其余的仫佬族人,散居于广西的宜山、柳城、柳江、都安等县市。

1990年罗城总人口33.97万人,仫佬族人口10.14万人,同1982年相比,增加3.22万人,增长46.5%;壮族人口13.51万人,增加0.84万人,增长6.61%。仫佬族人口增长速度是壮族的7.03倍,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还有一部分增加的仫佬族人口,是因为自治县成立之后根据民族政策重新确立了其仫佬族的民族成分。^③

2001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口的民族结构情况如下:汉族94 157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26.47%;壮族143 169人,占全县人口总数40.24%;仫佬族110 893人,占全县人口总数31.17%;瑶族3825人,占全县人口总数1.70%;苗族1524人,占全县人口总数0.42%;侗族1804人,占全县人口总数0.51%;毛南族115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写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概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吴保华、胡希琼主编:《仫佬族历史与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③ 广西区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03%；其他民族266人，占全县人口总数0.07%。^①

罗城的仡佬族以县内的东门、桥头、四把等镇为主要聚居区；壮族以怀群、兼爱、天河、乔善、纳翁、黄金、宝坛等乡镇为主要聚居区；小长安、龙岸两镇及东门镇是汉族的主要聚居区。人口较少的侗、苗、瑶等民族聚居于乔善、黄金、龙岸、小长安等乡镇的少数村庄。

罗城仡佬族多聚族而居，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常常居住在同一村庄，只有在圩镇或较大的村庄才与别的民族、别的姓氏杂居。据统计，自治县内仡佬族聚族而居的村庄共有278个，约占全县村庄总数的12%。其中以东门、四把两镇最多，共228个，占全县仡佬族聚居村庄的82%。^②

三、交通

自治县境内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有险要山隘115处，道路艰险不啻蜀道。昔人曾兴叹，“惜无有能疏凿之者”。

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全县不通汽车、火车，运输全靠肩挑、背扛、马驮。虽然武阳江、东小江下游一段可通行小木船，但滩多水险，运输周期长，货运量不大，难以发挥作用。从1952年开始，自治县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并举，持久作战与突击运动结合，专项拨款与自筹资金齐上的办法，大力发展交通运输。1955年修通了浮石至罗城通宜山公路干线，及县内罗城至龙岸、罗城至黄金两条支线。1956年7月，正式通行班车。1958年，又陆续修通了四把至天河、天河至怀群、天河至乔善等支线。至此，全县各乡镇都已通汽车。

为了发展山区民族经济，20世纪60年代，国家投资修筑三岔至罗城的铁路，1971年正式通车。枝柳铁路也通过自治县，在县境内有两个车站和一个乘车点。这两段铁路在罗城境内共长56.19公里，是仡佬山乡交通运输的大动脉。^③

四、经济发展概况

罗城仡佬族自治县成立20年以来，取得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3年与自治县成立前的1983年相比，全县生产总值增长4.2倍，财政收入增长2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7倍。全县村村通公路、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全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县有少数民族干部4807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8.7%，比其人口所占比例高出4.7个百分点；仡佬族干部2449

① 罗城县统计局：《2001年罗城县统计资料汇编》。如果统计数字有出入，仍以此为准。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写组：《罗城仡佬族自治县概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写组：《罗城仡佬族自治县概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